

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范例

□ 韦取名 王政

作义集团、进而和平解放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从1948年12月21日开始，我军开始对华北国民党军队发起作战。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心和部署，决定对傅作义在平津地区国民党军队部署的“一字长蛇阵”实施“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作战方针，使傅作义在军事上彻底丢掉幻想，让北平成为军事围困的孤城。

歼敌主力，断敌西窜。首先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个据点之敌。歼灭傅作义王牌第35军的新保安战役是平津战役的第一仗。1948年12月22日晨，我华北军区第2兵团与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的一个炮兵团，向新保安发起总攻，经10小时激战，全歼第35军军部及2个师，军长郭景云自杀。23日，我华北军区第3兵团及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对从张家口仓皇向北突围、企图撤回绥远的敌第11兵团共7个师（旅）5.4万余人，实施堵击、追击，于24日16时分割围歼于张家口东北地区，收复张家口。

强攻天津，断敌军援。为进一步孤立北平，动摇傅作义固守信心，中央军委命令我东北野战军一部及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严密包围北平的同时，以东北野战军主力积极准备攻取天津。国民党军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自恃“大天津堡垒化”，企图负隅顽抗。我东北野战军调集5个纵队和2个师，共计34万人，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统一指挥，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法，经过29个小时激战，歼敌守军第62、第86军等部10个师及地方部队共13万余人，俘虏指挥官陈长捷，解放天津。这时，据守塘沽的5万敌人见大势已去，仓皇乘船南逃，我军追歼其后尾3000余人，解放塘沽。至此，使傅作义在军事上彻底失去负隅顽抗坚守北平的筹码。

以打促谈、攻心为上

天津解放后，北平国民党守军25万人陷入了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使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免于战火摧残，以及城内200多万市民免遭生灵涂炭，中共中央在积极指挥军事作战的同时，不断加强政治攻势，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

巧设战局，以打促谈。平津战役开战之前，傅作义派出非正式代表试探中共态度，企图暂缓我方军事行动。于是，我方充分利用他举棋不定的时机，我方部署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迅速分割包围敌人，使其完全陷入被动。在这种形势下，傅作义不得已派出正式代表与我军举行了第一次正式谈判。这次谈判，傅作义提出解放军停止攻击，撤回新保安。而我军代表则强调一切谈判条件以国民党军队解除武装为前提。首次谈判，双方条件相差太远，没有取得成果。针对傅作义仍然自视甚高、幻想保留其军队的想法，为了敦促他早下决心，中央军委及时做出包围平津而不打，集中力量斩断其“西翼”的决策。先后解放新保安和张家口，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傅作义在战场上连吃败仗，不得不回到谈判桌前来，与解放军进行第二次正式谈判。这次谈判双方基本达成了共识：傅作义军队调出北平、天津两城，用整编的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特别说明：1月14日是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但傅作义迟迟没有答复，希望凭借天津的坚固城防拖延时间，增加和谈的筹码。为了彻底粉碎傅作义的幻想，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向天津发起猛攻，只用了29个小时，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防线灰飞烟灭，使北平完全陷入孤立。我军强有力的军事攻势，对推进和平谈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双方很快签署了和平改编的协议。

攻心为上，力促和谈。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的整个过程中，北平地下党做了很多努力，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影响傅作义，不停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促其和谈。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把中共地下党员、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派往北平，一方面照料傅作义的生活，一方面做父亲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在傅作义派出代表与解放军开始谈判后，傅冬菊每天都把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汇报给党组织，使党组织能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思想动态，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工作。除此之外，毛泽东对于和平协议的内容也反复斟酌，强调傅作义是为了保全文化古都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战火蹂躏而进行改编，既不是战败，也不意味着对蒋介石的“背叛”。这充分尊重了傅作义的感情，有力推动和平解放的迅速实现。

毛泽东把北平的和平解放称作“北平方式”。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巨大而深远，为当时尚待解放的湖南、新疆、云南等地提供了范例，大大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共和国大将的1937

□ 吕 丹

大力开展军事教育

31岁的罗瑞卿在担任抗大教育长及主持抗大工作期间，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大批进入抗大。10月，罗瑞卿主持召开抗大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学习延安会议和洛川会议精神，同时批判党内错误思想，为增进红一、二、四方面军干部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极大地鼓舞和影响了共产党人的政治生活和工作状态。抗大人自己动手，挖窑洞、修公路，解决校舍困难。罗瑞卿在毛泽东指导下，开始对《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著作进行构思和写作，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经验。

29岁的许光达正在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汽车训练班学习。11月，伤愈后的许光达拒绝苏联边防军司令的挽留，在组织安排下离苏返国。1938年1月，许光达回到延安，后历任抗大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等职，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致力于培养抗日军政干部。许光达在抗大任职期间先后发表《抗大在国防教育上的贡献》《论新战术》等文章，为抗日战争时期培养军政干部、探索战争经验、开展军事理论研究等作出了贡献。

听党指挥服务抗战

34岁的萧劲光时任红军后方司令部参谋长，他被毛泽东称为科班出身的第一个学军事的军事家。自2月萧劲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度过了难忘又光荣的8年岁月。8月，在洛川会议上，萧劲光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保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作为革命大本营的决策。他有理有据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最终大家都同意了这一意见。这也是萧劲光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八路军成立后，萧劲光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将留守在中原地区的部队改称留守兵团，萧劲光担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泽东把整个陕甘宁大后方的安全都交给萧劲光，体现了党中央的高度信任。

3月，45岁的张云逸担任红军后方司令部代理司令员。4月底，张云逸受党派遣前往广州、香港、桂林、福州、武汉等地开展工作。在华南期间，张云逸指导了滇桂边和琼崖游击区的谈判改编，积极开展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大力开展宣传工作，并赴闽西游击区向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传达中共中央的重要指示。在武汉期间，张云逸参与筹建新四军军部及与国民党谈判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等诸多事宜，并担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等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3月，32岁的王树声凭着“一定要回到延安，一定要找到党”的革命信念和坚强意志，从祁连山跨越荒无人烟的腾格里沙漠，孤身辗转，历尽千辛万苦，于8月回到延安。“人回来了就好”，毛泽东的话让王树声热泪盈眶。这年秋，王树声进入抗大第三期和马列学院第一期学习深造，并在之后被任命为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等职，多次指挥所部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抗日根据地贡献力量。



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嘉陵江战役

□ 杨恒磊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位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在北至陕西南部、南至涪江的广大区域内发起嘉陵江战役。此役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川陕会剿”计划，在成都平原西侧开辟出新的革命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红四方面军成功实现了向西的战略转移，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实现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

声东击西，调虎离山。1934年9月，历时10个月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反对国民党六路围攻的胜利，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受到了严重损伤，红军自身损失了2万余人。国民党改变策略，采取堡垒主义方针，集结约200个团、近30万的兵力将川陕根据地团团包围，红军发展面临困境。1935年1月22日，中央军委给红四方面军发来电报，要求集中全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根据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作战方针，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沿江敌人向北行动，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从而造成国民党重兵包围圈的薄弱环节，实行战略转移。

2月初，红四方面军12个团向陕南集结，3日，红10师主力及红12师兵分两路攻克陕南门户宁羌、阳平关。随后红4军、9军、30军各一部，分三路继续向宁羌、阳平关东北方挺进，伺机占领陕西南部重要城市沔县、褒城、南郑。红军于8日对沔县发起攻击。由于国民党军突然向沔县增援，红军进攻受阻，激战半日，进展不大。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决定采取两翼迂回战术，一部继续正面进攻沔县，

余部绕道敌后断其退路。敌军军心动摇，红军乘胜追击，一举歼灭沔县国民党守军，包围褒城，并继续向南郑出击，威胁国民党控制的川陕大道。为防红军沿川陕大道继续北进威胁后方，国民党紧急将嘉陵江上游广元—昭化一线的部队北调以防不测。就这样，嘉陵江中游敌人力量的减弱，北调敌人的目的已经达成。2月中旬，红军迅速南返，准备突破嘉陵江。

夺取咽喉，做活“棋眼”。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从苍溪至阆中段强渡嘉陵江。事前，徐向前通过前线侦察并结合敌我双方具体情况分析后认为，嘉陵江上游的剑门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一旦红军拿下剑门关，就能有效阻击嘉陵江上游国民党邓锡侯部近21个团的兵力南下增援，在红军渡江工具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为红军渡江争取时间，做活整个战役的“棋眼”。相反，倘若剑门关仍被国民党军掌握，一旦红军大规模渡江开始，国民党军会马上弄清红军意图并向南折返回援，击我于半渡，这样红军将陷于骑虎难下的境地。因此徐向前命令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渡江后迅速北上夺取剑门关。

28日夜，红30军第88师先头部队从塔子山秘密渡河，歼灭敌守军一个营，建立起登陆场，随后第88师两个团快速渡江夺取虎山等制高点，建立纵队。与此同时，红31军、9军、4军开始渡江作战。

4月2日，红88师、93师和91师1个团兵分三路，采取迂回包抄方式，很快击溃防守剑门关南部汉阳铺的国民党军第3团，肃清了剑

门关关口外国敌人。敌军被迫退守主峰，凭借地形和火力的优势负隅顽抗，红军几次攻击都被打退，伤亡严重。负责指挥剑门关之战的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根据战场形势，作出决定：以炮兵作为掩护，派突击队冲锋。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有“夜袭常胜军”之称的第93师第274团第2营。该营指战员在有限炮火支援下向剑门关主峰发起冲击，至2日黄昏，红军全歼敌3个团，占领了剑门关。负责防守剑门关的敌第28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部逃跑。

孤立顽敌，围城打援。剑门关失守后，国民党遂即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以期把红军消灭于嘉陵江和涪江之间的平原地区。兵贵神速，红军决定立刻抢占成都北方门户江油，粉碎国民党的计划，胜利结束嘉陵江战役。

4月9日，红9军从牟家渡渡过涪江，次日对江油形成包围之势。由于江油敌军依托坚固的工事和优势火力据守，红军久攻未果。此时，得知江油被围的战情后，四川军阀刘湘慌忙凑集了10个团在邓锡侯率领下支援江油。徐向前在分析了战场形势后认为，江油城在短期内难以攻克，红军如果继续攻城，很有可能被国民党军两面夹击。于是决定红军暂停攻打江油，围而不打，孤立要敌，打击援军。他命令红军兵分三路，红9军第27师继续包围江油，红9军第25师、红30军第88师、红40军第10、11师一部在江油南部的塔子山和鲁家梁子构筑工事，形成围城打援之势。

4月18日，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红军阵地发起了集团冲锋。经过激战，敌军攻占红军中西部山地结合处。在危急时刻，负责前线指挥的红4军军长许世友命令红28团奋勇战斗以夺回这一重要阵地。战斗持续到当日下午，火红的军旗再次插到了阵地上，红军虽伤亡较大却无一人后退，战士们纷纷高喊“人在阵地在！”经过11个小时的艰苦作战，终于击溃塔子山的敌第11旅。在这一形势下，许世友果断决定，要求抓住这一有利战机，断其退路，主力从两翼实施反击。在我军夹击之下，援军纷纷溃败，后撤20公里，红军乘胜追击，于19日攻克彭明，21日攻占北川。江油守军最后希望破灭，军心动摇，红军迅速发起进攻，一举拿下江油县城，至此，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

在嘉陵江战役中，红四方面军避实击虚，灵活机动，重点突破与全面开花相结合，共歼敌12个团约1万余人；自身兵力扩充到8万多人；攻克县城8座，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达青川的近三百里的广大区域，成功实现了战略转移。徐向前高度赞扬嘉陵江战役是“牵动全局的作战方针”。

